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的胡化元素

□ 卢 昉

摘 要：丝绸之路这条贯通中外的交通要道，在李唐王朝和西域诸国文明交汇中起到关键作用。作为唐代绘画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墓葬壁画不仅以造型样态图证历史，诠释现存文献资料，还能从考古学角度补充文本缺失。图像本体是研究唐代丧葬制度、社会习俗、审美风格，以及民族交融的实证资料。本文以唐代长安地区几座重要墓葬为切入点，管窥其中包含的胡化元素，以此探析唐代胡汉相融的历史史实。

关键词：唐墓壁画 胡化 长安地区 中外交融

现存唐墓壁画集中体现了唐代绘画风采，其内涵的精神气质，外显的表现形式，也曾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宫室、殿堂、邸宅、佛寺、道观、楼榭及亭台中。唐代兴盛厚葬，墓葬壁画丰富，加之胡汉贸易交流频繁，因而壁画包含大量“胡化”元素。从胡服、胡器，到胡乐、胡舞，唐墓壁画中的汉胡融汇场景显示出隋唐时期中西交融及民族交往的历史史实。截至目前，已正式发掘的唐代墓葬约有3000余座，其中壁画墓100多座，这些墓葬壁画又以长安地区的房龄大长公主墓、永泰公主李仙蕙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及章怀太子李贤墓最具代表性。

一、唐朝的胡化之风

有唐一代，政治开放，经济繁荣、文化多样。丝绸之路这条贯通中外的交通要道在李唐王朝和西域诸国文明交汇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唐代社会开放、民族政策宽容，高祖李渊及太宗李世民皆有鲜卑血统。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孤独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为胡种，而非汉族”，又述“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1]唐朝和许多民族及国家保持频繁的政治经济往来。长安城内胡人众多，不少胡人甚至在朝为官。“胡风”和“胡化”一度在长安成为流行时尚。后晋赵莹主持编修的《旧唐书·卷四十三卷》载，唐自武德（618—626）至开元（713—741）的一百二十余年间，先后与近三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广泛密切的联系。“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二王后及諸蕃朝聘之事。二王之後，鄾公、介公。凡四蕃之國。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2]。唐朝开明的外交政策和开放繁荣的社会氛围，大批域外使节来仪。为此，长安城内设立鸿胪寺和客典署，专门负责管理接待外国使节及少数民族。不仅如此，还为使节提路费、食宿、翻译、医疗及丧葬等各种优待[3]。

作为唐代历史画卷的唐墓壁画，包含了诸多胡风及胡化元素，有胡人胡物、胡乐胡舞、胡器胡皿，从人物到器物，从制度到风俗，描绘出一幅幅唐代社会胡汉相融、中西交流的历史人文画卷。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中的《客使图》展示外邦往来与交流场景，印证了外交礼仪制度。西安市长安区西兆村M16唐墓壁画中的“胡坐”吹箫仕女，则从生活习惯方面再现了唐人的胡化现象[4]，为研究唐代中西文化交融提供宝贵资料。

二、唐墓壁画中的胡化元素

（一）胡器

唐代已降，粟特、萨珊波斯风格的金银器和琉璃器在长安地区甚为流行。《旧唐书·吐蕃传》载，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吐蕃曾向李唐王朝进献“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玛瑙杯一”[5]。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淮南节度使王播入朝，“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6]。这些文献中出现的器物名称，大多均能与高官贵族墓壁画中的器物相对应[7]。

在唐代，金银器皿多为高级贵族使用。房陵大长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梓州刺史李震墓、貌王李凤墓等墓葬壁画中，皆发现金银器

皿。这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吻合。目前，能清楚断定绘有金银器的年代最早的唐代壁画墓，是1990年在陕西富平县吕村乡双宝村发现的唐高祖李渊第六女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8]。该墓壁画所描绘执壶、高足杯、方盒、托盘等物，形象地再现了唐代金银器的形制、用途与使用方法[9]。此外，类似题材在乾陵三墓壁画中皆有发现。如章怀太子李贤墓的甬道西壁壁画中，有一侍女怀抱执壶，该壶壶颈细长，小口前伸，壶身带把，带有非常典型的西域风格。同时，房陵长公主墓后室北壁西侧仕女手中所提执壶与此壶形制类似，应该也是西域之物。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前室北面第一位宫女手中捧有一件直筒带盖莲瓣纹金杯[10]。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壁画上的男装捧盒仕女双手捧了一件盝顶宝相花方盒[11]，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中也有类似发现。对照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出土的孔雀纹盝顶银方盒分析[12]，有学者认为此盒应为盛放妇女化妆品的奁具[13]。

除金银器外，唐墓壁画还出现了一些琉璃器。如永泰公主墓中装盛黑色饮品的高足琉璃杯，还有该墓前室西壁绘制的摆放葡萄的大琉璃盘。房陵大公主墓壁画中的侍女所捧的多曲琉璃盘，等等。这些琉璃器多为西方制品，造型精美、种类丰富，且体量大、透明度好。一直以来，中国境内发现的琉璃器数量较少。法门寺地宫曾出土迄今为止数量最大、质量最高的唐代琉璃器共计20件，其中仅有一套茶盏及茶托为唐人自制，其余19件均为大食国阿拔斯王朝进献李唐王朝的贡品，而其中最大的琉璃盘，体量不及永泰公主墓壁画上的琉璃盘大。这些唐墓壁画上琉璃器明显已超出唐王朝的琉璃制作水平，应为外来物件。

（二）胡服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元稹的乐府《法曲》形象地为我们描绘出长安女子对胡服胡妆的热衷时尚。大量文献典籍和实物资料显示，唐代妇女对胡服胡妆尤为喜爱，阳刚之风与阴柔之气和谐互补。唐人姚汝能撰写的《安禄山事迹》记载：“天宝初贵游士女好衣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此文虽为别史杂记，但仍能从侧面显示出天宝年间，胡风装束在唐代是一种颇为流行的时髦风气，正所谓“女为胡妇学胡装”的现实场景折射在壁画中，定格大量引人注目的胡服女性形象。这些鲜活的壁画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文献典籍中难以寻觅的细节，以形象直观反映了中亚文化交流及多民族融合对服饰的影响。例如永泰公主墓宫女图中位于队列最后的绿衣少女，身着翻领窄袖衫，腰间束带，长裙下露窄腿裤，脚穿尖头鞋[14]。此外，2011年6月，陕西历史博物馆征曾收集一批唐墓壁画，其特殊之处在于壁画直接在墓砖上绘制，损毁较严重。其中有两件胡服仕女，一件头部损毁无法辨认，仕女身着男式胡服、翻领窄袖、腰系皮带、下着黑白条纹长裤，脚穿麻线尖头鞋[15]，另一件损毁亦较严重，但仍能辨认仕女服饰，仕女着男装胡服，头戴幞头，身着翻领窄身胡服及条纹长裤，英气隐于阳刚之中。2013年3月，西安市长安区西兆村M16唐墓壁画墓中的胡服舞蹈仕女，左臂上举至头顶，右臂下垂，双手均隐于袖中。仕女身穿绣花胡服长裙、翻领窄身长袖、脚穿麻线尖头鞋，腰束皮带，带上系鞶囊，从服装及动作分析，应该是在表演胡舞[16]。

（三）胡乐与胡舞

作为唐朝京畿的长安地区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艺术中心。据唐人杜佑所撰《通典》载，唐代流行多种异国音乐舞蹈，展现了东方动力之都的风采，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唐代统治者对胡乐胡舞的喜爱及推崇。《旧唐书·音乐志一》载：“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胡乐和胡舞在唐代极为盛行，无论皇家宫廷、贵族府邸，还是民间教坊、街头杂院，无论王朝都城，还是藩镇关隘，到处可闻胡音，到处得见胡舞。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龟兹乐、库车乐、西凉乐……这些来自西域的乐舞传至长安后，迅速和汉地乐舞糅合，进而形成胡部新声、霓裳羽衣，等等，冲击了宫廷乐制，在唐王朝自上而下皆受欢迎，其“般遮调”在中原长期流行，至今传唱于民间。唐墓壁画中的“胡乐胡舞”元素同样引人注目。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长安地区正式发掘的100多座唐代壁画墓中，有30多座关于乐舞的壁画。其中以韩休墓、苏思勖墓、朱家道村墓、执失奉节墓等最为著名。这些乐舞图中的乐舞伎或为胡人，或着胡装，或胡汉掺杂，服装保留胡服样式，即便汉族乐舞伎表演也多着胡服，所奏乐器主要以琵琶、箜篌、羯鼓等胡乐为主。

唐墓壁画中的胡化元素是唐代胡汉文化交融的物证化显现，藉由开放的社会风气，和谐的内外关系和积极主动的对外交流，在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建立了一座矗立于东方的繁荣之都。唐墓壁画通过具体的形象图示，可视的空间场域，多彩的服装配饰，强烈鲜明的形色，为我们了解唐代墓葬制度、社会习俗、审美风尚，乃至宗教信仰、时代精神提供了大量图像参证，不仅对现存典籍有诠释作用，还验证了部分文献空白，是研究唐代艺术不可替代的重要支点，以此可依据“二重证据法”，深刻认知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的胡化元素的历史成因及演化进程，从而对图像实证进行较为完整地把握和解读。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丝绸之路艺术品中的国家意识》（项目编号：17JHQ009），2018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丝绸之路汉唐艺术品中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18JK0590）研究成果。

[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

[2]《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32页。

[3] 程旭《胡汉相融惠大唐——唐墓壁画中的胡人》，《荣宝斋》2017年8期，第142、143页。

[4] 程旭《长安地区新发现的唐墓壁画》，《文物》2014年12期，第72页。

[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31页。

[6]《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王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77页。

[7] 齐东方《唐墓壁画中的金银器图像》，《文博》1998年第6期，第68页。

[8] 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l期，第3~5页。

[9] 齐东方《唐墓壁画中的金银器图像》，《文博》1998年第6期，第66页。

[10] 梁子《唐墓壁画与唐代社会风尚研究》，《乾陵文化研究》，第195页。

[1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第18页。

[12] 齐东方、申秦雁主编《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13] 程旭《长安地区新发现的唐墓壁画》，《文物》2014年12期，第72页。

[14] 乾旭、高嵘《有形的史诗——大唐墓室壁画》，《文博》2004年2期，第72页。

[15] 程旭《长安地区新发现的唐墓壁画》，《文物》2014年12期，第73、74页。

[16] 程旭《长安地区新发现的唐墓壁画》，《文物》2014年12期，第77、78页。

（作者工作单位：西安美术学院）

（上接第36页）

间意味深长。

“道德之门”作为纯阳宫明代的正门，它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道德之门”就是“入道之门”。

[1] [元]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道藏》影印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2] 鲍永玲《直心为德及意象考释》，《哲学分析》，2011年03期，30页。

[3] [清] 张廷玉《明史》卷二九八《孙一元》，中华书局，1974年7629页。

[4]《增订太白山人漫稿》附录，明万历二十五年张睿卿刻三十九年增刻本。

[5] [清] 张廷玉《明史》卷二九八《孙一元》，中华书局，1974年，7629页。

[6] [唐] 李延寿《南史》卷七十六列传第六十六隐逸下《陶弘景传》，中华书局，1975年。

[7] [唐] 魏征《隋书》卷三四十志第二十九经籍三·子，中华书局，1997年。

[8] [唐] 李白等《全唐诗》卷155，中华书局，1985年。

[9] [清] 董皓《全唐文》第02部卷一百六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艺术博物馆）